

隱藏於出版社背後的使命感： 陳坤崙先生訪談錄

撰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專案助理 林謙仔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代理主任 莊建華

訪談時間：2024 年 3 月 7 日（四）

訪談地點：柯旗化故居（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 37 號）

訪談、記錄：林謙仔、莊建華



圖 1 陳坤崙先生受訪照



圖 2 訪談陳坤崙先生

圖片來源：林謙仔拍攝，2024 年 3 月 7 日。
圖片來源：蔡沐恩拍攝，2024 年 3 月 7 日。

壹、訪談緣起

二戰後，高雄市曾有大大小小數十家知名且歷史悠久的出版社，如出版文學名著的大舞台書苑、大業書局及春暉出版社。其中又以春暉出版社的陳坤崙社長見證了高雄市早期出版狀況，因此訪談者從高雄市出版史的角度著手，了解陳坤崙社長創辦春暉出版

社前後的經緯，並說明春暉出版社曾經在高雄出版界及臺灣文學史發展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讓陳坤崙社長用親身經歷提供第一手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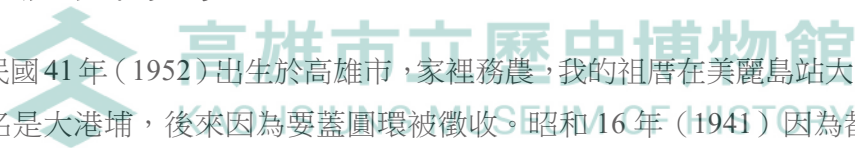
陳坤崙，民國 41 年（1952）生於高雄市。初中開始便對文學產生興趣，並在文學刊物上發表詩文。後於民國 65 年（1976）進入大舞台書苑出版社擔任主編等職，踏入高雄出版界，到民國 69 年（1980）創立春暉出版社，民國 71 年（1982）創辦《文學界》，秉持著知識分子的理想——維持言論及出版自由、發展臺灣文學，也因為結識林曙光、葉石濤、柯旗化等人，即使在噤聲的戒嚴時期，仍不忘初衷。後來面臨出版業蕭條之時，亦堅持出版實體書，為臺灣文史發聲、保留資料，著實為有使命感的臺灣文學家。現為春暉出版社、第一出版社及文學台灣雜誌社之社長。

貳、家庭與求學

我是民國 41 年（1952）出生於高雄市，家裡務農，我的祖厝在美麗島站大圓環附近，當時的舊名是大港埔，後來因為要蓋圓環被徵收。昭和 16 年（1941）因為都市計畫的緣故，才把位於哈瑪星的高雄車站設到現在位址。為了方便通往高雄州廳，便從中山路開闢大同路，可以直接從車站轉往州廳。我的家中有三位哥哥、一位姊姊、一位妹妹，現在只剩下我和妹妹還在世。

我的國小就讀大同國小，大同國小當時是明星學校，又因為接近高雄市區，也有不少學生遠從屏東來高雄就讀，當時全校約有六千多名學生。小時候因為家裡務農，所以入學前，我連注音符號、姓名都不會寫，就直接讀一年級，後來初中考到高雄市立第七初級中學（今鼓山高中），當時高雄初中需要經過考試，成績最好的是市立二中（今前金國中）、市女中（今新興國中）、三中（今獅甲國中）、七中。當時的制度是只要班上前五名可以保送初中，其餘的同學就必須參加考試，我便是考試進入七中。初中畢業考上高雄高工，分發志願時，是我三哥幫忙登記汽車修護科，一進去就讀就馬上進行實作，因為我對汽油味很敏感，聞到會頭暈，所以我大概讀不到一個月就退學了。

退學後，我就到處打零工，例如幫忙貼壁紙、板模、木工、拆船業、去菜市場賣自己煮的冬瓜茶和紅茶等等，當時打工一天臺幣 80 元。後來，要再去讀書時，身體就出



了狀況，某天在路上走的時候，突然流了鼻血，檢查後才知道得了非開放性肺結核。突然的病變，改變了我的人生，變得比較自卑，因為當時肺結核算是比較嚴重的病，類似今天的癌症，須要靜養。因此，一年來都持續在追蹤及檢查身體狀況，對於未來的事情也感到迷惘。

對於肺結核的病症，靠著不斷靜養及治療，後來在 802 國軍高雄總醫院遇見了已經忘了名字的楊醫師，開了當時難得的特效藥，才慢慢地讓我從疾病中恢復過來。修養一段時間後，我重考入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就讀，之後再轉到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最後在復華高中完成學業。

參、文學的啟蒙

正如我所說，我的家庭是務農的，與文學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談到文學啟蒙，鹽埕區大勇路上的大業書局算是我接觸文學的重要推手，我年輕時常去大業書局看書，老闆陳暉都不會趕我，還會幫我介紹書籍，也因此我接觸到不少的文學作品。

另一件有趣的經驗是我讀初中一年級時，老師把我撰寫的作文，投稿七中的校刊——《曉鐘》，當時能在校刊上刊登文章，都是高年級學生較多，一年級學生能刊登非常罕見，我在同學間就變得較有名氣。當時流行交筆友，同學們認為我的文筆較好，便紛紛找我代筆。我為了精進自己的文筆，閱讀了更多文學作品，像時下流行的王尚義《野鴿子的黃昏》等。另外，我在初三時就曾在《文壇》雜誌發表過新詩，¹還記得當時稿費一首詩 15 元。我也常與高中同學聊天，多是文學、思想等等話題，什麼都聊，我家裡是三合院，在今天的中山路和民生路交叉口，同學們有路過就會跑來跟我談天，家人都不會拒絕。

我高中畢業後，為了生計，繼續打零工為主。後來有機會到黑松汽水的高雄經銷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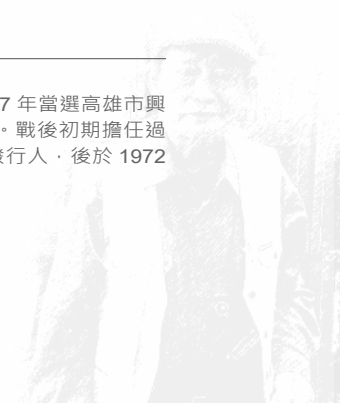
1 《文壇》雜誌在 1952 年 6 月創刊於臺北，直至 1986 年 1 月停刊（1957 年曾短暫停刊過一次），共出刊 303 期，是臺灣早期少有的純文學雜誌。《文壇》雜誌不限文長，提供作家刊登的園地，並持續出版長達三十多年，對臺灣文學的推展，有實質的提升及貢獻。

司上班。當時的薪水開價很高，一個月有臺幣一萬多元，當時教師的薪水一個月大概也只有兩、三千元左右。上班一段時間後，想著需要再去讀書，加上也存了些錢，因此毅然辭去工作，進入臺灣大學中文系夜間部進修，也正式踏上了文學領域的路程。就學期間，我對文學的興趣越發濃厚，我雖然是讀夜間部，白天我也儘可能地會到日間部，或其他如臺師大、淡江等學校聽其他老師的課程，像臺灣大學外文系王文興老師開設的英美文學、師大國文系教現代文學的楊昌年老師等，這些課程都激發我對文學有更細緻的體悟。後來，我自己得出一個心得，臺灣文學後來會出現這樣多人才，其實與這些老師有關係，舉例而言，小說的部分，上課的過程中，老師們會細膩地要求學生該如何描述情境、營造氛圍、鋪陳感情及刻畫細節等等，訓練的過程非常扎實。

肆、踏入高雄出版界

踏入出版界，其實也是因緣巧合，民國 65 年（1976）左右，我從臺大夜間部結束進修返回高雄。在三信出版社的林曙光知道鹽埕區的大舞台書苑出版社有個編輯職缺，就推薦我去任職，開價月薪臺幣 6,000 元。我自己的規劃是大學畢業可能當個國文教師或者投身自己有興趣的出版業，所以一有職缺的機會，便放棄進修決定到大舞台書苑出版社。有趣的是出版社只有聘請我一位編輯，我自己得身兼主編、編輯、經銷等，全部都是二人作業。加上三信出版社和大舞台關係非常好，三信出版社自己有印刷廠，大舞台書苑出版的書籍則多委託給三信印刷廠印製。三信的印刷廠就位於三信家商的地下室內，我當時就在那裡辦公。至於三信出版社及印刷廠會創辦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三信合作社的單據、三信家商的學生講義，如果要印製時，常常需要委託給其他印刷廠，換算成本下來，其實沒有太划算，所以當時負責經營的林曙光便有開設印刷廠的構想，與當時的理事主席林瓊瑤建議後，² 便開辦了三信出版社兼印刷廠。

2 林瓊瑤（1914-1979），高雄出身的實業家。畢業於名古屋中學及早稻田大學，學成後返臺，於 1937 年當選高雄市興業信用組合常務理事，戰後，興業信用改制為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林瓊瑤一直連任理事至其歿。戰後初期擔任過高雄市參議員，連任第一屆市議會議員，1970 年由三信高商創辦三信出版社，林瓊瑤出任社長兼發行人，後於 1972 年當選為國大代表。



我並非科班出身，出版及印刷經驗都是進到出版社後才開始慢慢學習。因為大舞台書苑出版社頗具知名度。所以，我請廠商估價時，廠商較願意配合我，我自己也會請廠商詳列估價資料，例如印刷的紙材、本數、臺數、一頁的成本控制等印務細節，我是從中一點一滴地學習，透過與廠商的交流，我才慢慢地學會印刷的知識及如何正確地抓列成本等。

我在大舞台書苑第一本出版的書籍是《王貞治》，書籍出版後其實並不暢銷，後來陸續出版了《法國散文選》或德國、法國及日本文學方面的書籍，算是引介外文書籍進入臺灣市場，遇到需要翻譯的部分，我這邊就找身邊朋友協助翻譯。另一方面，出版社也會出版一些暢銷書，例如，老闆希望能出版關於日本三井財閥的書籍，³當時我就邀請葉石濤（鄧石榕）先生來翻譯該書。當時要出版什麼樣的書主要是由我規劃與決定，但我會定期向老闆報告，而且老闆不會干涉我。

林曙光是以前郭國基的文膽，⁴主要是負責協助郭國基起草演講稿或質詢稿。我到大舞台書苑出版社時，老闆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編纂郭國基的言論集及政壇記憶等書。我當時就把所有省議會質詢稿、公報都閱讀整理後，陸續出版了《郭國基言論集》與《郭國基選壇馳騁錄》等書。會出版郭國基的相關書籍，是因為郭國基的兒子郭拔山要為父親做紀念。郭國基那本書看了會讓人熱血沸騰，早期的政治人物知識淵博，對於諺語使用非常得心應手，例如他講「乞丐趕廟公」（閩南語）時，描述國民黨來臺時的情形，言論風格犀利，成為當時國民黨頭號頭痛的政治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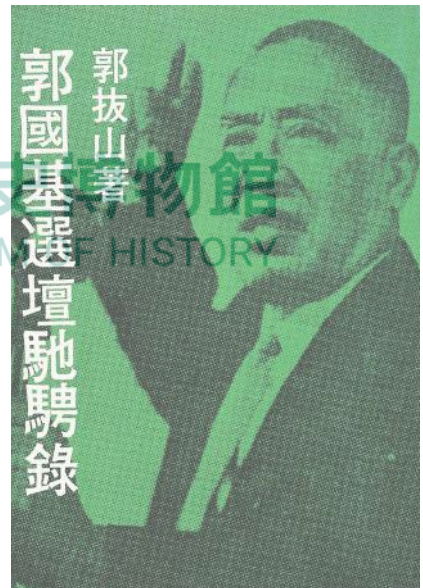


圖3 《郭國基選壇馳騁錄》

圖片來源：郭拔山，《郭國基選壇馳騁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6.016.059。

3 該書由小島直紀撰、鄧石榕（葉石濤）譯的《三井財閥興亡史》，大舞台書苑於1976年出版。

4 郭國基（1900-1970），出身於屏東東港的政治家。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1920年代臺灣文化意識抬頭時，郭國基加入了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且因其剛烈直言之性格，當時被林獻堂譽為「郭大砲」，並見稱於戰後的臺灣政壇。郭國基於東京留學時，曾秘密加入中國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高雄市黨部黨務指導員，然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的種種行徑讓郭國基反感，便走上與國民黨對抗之路。郭國基在戰後發揮「郭大砲」的角色，前後曾於臺灣省議會擔任長達二十五年的議員，之後轉任立法委員。即使在二二八事件被捕入獄210天，仍沒有改變「為民喉舌」的志向，在省議會期間，與吳三連、李萬居、郭雨新、李源棧、許世賢等人，合稱為「五龍一鳳」。

高雄出版界概況

戰後一段時間，高雄出版業多在鹽埕區，例如大業書局，主要都出版中國大陸來臺作者的書籍，例如司馬中原等。除了大業書局外，還有五福路上的百成、大眾書局，還有像現在還維持營業的人生書局。人生書局的老闆有段特別的經歷，相傳他是神風特攻隊的隊員，後因為任務臨時終止。我想他應該很受國民黨喜愛，因為他的身分以及那種犧牲生命、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如果寫成回憶錄應該很精彩。

除了鹽埕區外，高雄車站附近也很多出版社，例如前程書局，以賣課業參考書為主，現已結束營業了。其實當時高雄出版界，每個出版社都有各人盤踞的勢力範圍及經營的特色。我對於文學有興趣，所以大舞台書苑也以出版文學作品為主，但我規劃出版的文學書籍銷售成績都不太理想，不過幸好老闆也沒有責難我，有可能是我當時編纂郭國基那本書大賣幾萬本，銷量很好。

在當時，高雄出版界比起臺北、臺中而言，無論在排版、設計、印刷等等面向上其實還有很多需要進步的空間。書籍出版後，我都會到臺北、臺中去寄賣書籍，人家看到我就說：「你南部來的哦！」因為我出版的書籍看起來就土土的，書也印得不漂亮。

伍、關於春暉出版社的設立及那些事

民國 68 年（1979）隨著林瓊瑤過世，三信出版社和大舞台書苑出版社也陸續結束營業。三信家商其實有徵詢我有沒有意願留下來教書，但我沒有意願教書而婉拒。三信印刷廠跟著出版社一同結束營業時，我索性把裝訂部的機械設備一併買走，搬到愛河邊開設裝訂廠。

我在愛河邊開設裝訂廠時，便著手申請出版社的執照，當時出版社屬於特許行業，出版牌照相當難申請，後來春暉出版社便於民國 69 年（1980）設立。成立初期，春暉出版社主要業務都是負責印製三信家商的參考書、簿計冊，例如《會計與簿計》、《珠算練習簿》等。當時沒有什麼老師寫這方面專業的會計實用參考書籍，連高雄商工也沒有，只有這兩本。因此，除了南部書局會訂購外，北部的書局也都來買我的書。

為了拓展業務，在原有裝訂廠的基礎上，我再增購了印刷廠，使得書籍出版得以一

貫化作業。印刷廠本來是租在武營路上，後來移至武嶺街，這樣離我自己的住家也比較近。當時會以「春暉」當作出版社的名稱，是因為我讀孟郊的〈慈母吟〉：「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因此取了這樣的名稱。我後來才發現其實「春暉」這個名字也很多行業使用。

如果要問創辦出版社的原因，當然是要糊口賺錢，出版社最賺錢的工作就是出版。春暉光是出版三信及審訂版的教科書，在一年可以收入四、五百萬臺幣，這些教科書的收入直接挹注為出版社資金，如果僅靠寄賣的費用收入，通常需要押三個月或半年才能結算一次貨款，成本壓力很大，資金也不夠周轉。所以我把出版教科書賺來的錢拿來挹注出版社，出版人文、文學類的書籍，也讓出版社可以無後顧之憂。正因如此，春暉早期出版的書籍，通常都付給作者稿費。

然而，開出版社除了賺錢糊口的原因外，在我心裡還有一個隱藏的理想——透過出版社表達言論的自由。當然，會需要隱藏於心中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氛圍仍屬於戒嚴時期，言論都需要受到管制，稍有不慎就有牢獄之災。我自己是相親結婚，我在設定相親對象時，希望結婚對象婚後要隨時能照顧好我的父親，不去上班，第二個條件我隨時做好入獄的準備，希望在我入獄後太太能夠獨立生活。我太太是從臺南鄉下搬到港都戲院（位於今高雄市鹽埕區府北路），在路邊擺水果攤維生，我聽到太太曾在路邊擺攤，放心不少，因為能擺攤的人，是不論在什麼樣處境下，都可以為了生活而放下尊嚴。後來，我就在民國 75 年（1986）1 月 23 日自由日結婚，在當時算晚婚，同年 12 月小孩就出生了，婚後就一直住在正義路的春暉出版社這邊。

我自己會對於政治活動感到興趣，是因為小學、初中時期，我就常在選舉時聽候選人進行政見發表，埋下了我對黨外活動的熱情。老一輩政治人物多少都認識我，1980 年代臺灣民主運動正要起步時，許多黨外候選人都會找我幫忙印製文宣。當時每逢選舉的時候都異常忙碌，諸如高雄縣、市立法委員選舉，都叫我幫他們印文宣。選舉時，常常需要出門，他們隨時打電話就叫我過去，幫他們寫或修改文宣內容。美麗島雜誌社成立時，原本邀請我擔任高雄辦公室的主任，我當時因為出版社業務忙碌，加上當時的政治氛圍，如果結社肯定會被當局誣陷入獄，所以他們多次來邀請我，我都拒絕。

回想戒嚴初期，民國 50 幾年（1960 年代）時，情治單位常常不需要證據便可直接



圖4 陳坤崙（左）與德國漢學家馬漢茂（右，
Helmut Martin，1940-1999）於1982年
合影於春暉出版社印刷廠鉛字版前
圖片來源：陳坤崙提供。

抓人，後來到民國 60-70 年（1970-80 年代）左右，雖然不會直接抓捕，但就是用詢問、試探性的方式去了解你正在印製的內容。例如，情治單位的特務，就會跟我開玩笑說：「又接到命令了！我知道你沒問題，但我也沒辦法！（還是要來了解）」在整個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我算是站在第一線的人，出面印文宣、黨外雜誌等，所以警備總部常常來查出版社，只要一有風聲要印製可能詆毀政府的內容，會在出版前就來了解內容，有時候我的員工在中午用餐時，也被叫去問印刷內容。然而，我在面對情治單位的質問時，我都是以處之泰然的態度去應對，因為一旦我慌亂或被抓補，會牽連很多人，因此，每當情治單位問我問題時，我都會想辦法面對，避免他們順藤摸瓜地追查下去。這樣的情況即使到了民國 76 年（1987）7 月解嚴後，還是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言論自由的管制沒有這麼快鬆綁。

然而，近幾年出版業的確景氣不是太好。所以，我都要求作家一起合作，作者寫書讓出版社印製，若以印製量 500 本，每本售價算 100 元，由出版社回購 100 本加版稅，作者自己買回 400 本，出版社購買的部分，會鋪貨到各書店販售。另外，我也出版一些我覺得觀點特異，但別人不敢出的書籍，例如一位白色恐怖受害者所撰寫的臺灣史綱，我就詢問他，是不是其他出版社不願意協助出版。當時我就用上述的方式跟他合作出版，讓作者辛苦撰寫出來的成果能夠讓更多人看到，也算是對出版界盡一份心力。

隨著閱讀習慣改變，書籍的印量越來越少，現在一刷 500 本、300 本的情況都有。

有些還只是大學教授為了論文送審，只印 20 本，所以印刷廠也越來越難經營。以前出版業輝煌時，我請了 20 幾位員工，現在只剩下幾個人。二手書的平臺也越加發達，直接到網路上賣書還能回收一點金額。很多原因的累積，造成出版業日漸蕭條。

陸、與（高雄）文學家的結識與交遊

春暉出版社成立之後，我常利用出版社與高雄在地的文學家結識。但這不得不先談我和林曙光的关系與相識的過程。我和林曙光相識是因為我認識他的侄子黃俊魁，黃家在七賢路上做生意，我認識黃俊魁也是透過同學介紹，黃俊魁就讀文化大學，和李登輝的兒子是同學。我們常彼此交流各自對文學的想法，例如尼采等等。也因為這樣後來黃俊魁引介我認識他舅舅林曙光，但黃俊魁在大學未畢業前便過世了。

林曙光是臺灣師範學院史地系，在民國 38 年（1949）也參與《龍安文藝》的編輯，⁵ 後來發生四六事件，⁶ 師大和臺大的學生抗議，警總就去學校抓人，當時師大和臺大的校長就站出來，臺大校長傅斯年就說情治單位不能到學校逮捕人，而《龍安文藝》在當時也被燒毀。四六事件後，林曙光便回到高雄，當時高雄文學界的重要人物，林曙光其實都認識。我目前收藏的《龍安文藝》就是林曙光轉送給我，後來文學界也有將其復刻。我大概差林曙光三十歲，我和他一拍即合，當時還有陳冠學也常和我們一起聊天聚會。認識林曙光對我的影響也很大，讓我看到當時知識分子的品德，因為他以前曾是《國聲報》通信員，也是《臺灣新生報》的記者，當時的記者地位很高，能夠認識很多人物。他也常在跑採訪時帶上我，印象最深刻，是有次採訪余登發時，問了很多問題，但能寫

-
- 5 《龍安文藝》由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語戲劇社於 1949 年 4 月 2 日創刊發行，社長為蔡德本，由林曙光擔任編輯，為戰後第一本鉛字印刷的校園刊物，僅出版一輯。內容由 13 位作者執筆，共有 16 篇作品（創作方法論 3 篇、文學評論 1 篇、小說 3 篇、新詩 7 首、隨筆 2 篇），其內容溫和，無煽動、謾罵之文，但卻因為出刊後四日，發生四六事件，其中一位作者被通緝，為避免彼此牽連，緊急焚毀《龍安文藝》。直至 2002 年找到未被焚毀的《龍安文藝》，2003 年《文學台灣》第 46 期重刊全部內容，並刊載蔡德本〈《龍安文藝》終於找到了〉一文，介紹出版始末。
- 6 四六事件，發生於 1949 年 4 月 6 日，故名之。此起事件之起點，為 1949 年 3 月 20 日晚間，警察取締兩位共乘騎一輛腳踏車的學生，他們分別為國立臺灣大學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的學生，但雙方發生衝突，兩名學生被毆打並送至分局。隔天兩校的學生便包圍該分局，以遊行活動擴大民眾視聽，之後更擬成立全省性學生聯合會，學生與軍警的對立戰火持續。直至同年 4 月 5 日，彭孟緝奉省主席陳誠之命，為免影響社會秩序，擬逮捕兩校學生，但兩校學生不肯交人，堅守於校內，至 4 月 6 日，軍警以優勢警力及武器突破防線，大肆搜捕反抗學生，被捕者多達兩百餘人。此乃戰後軍警直接進入校園逮捕學生之首例，可稱為校園白色恐怖之濫觴，亦被視為戰後臺灣學運之指標，史稱「四六事件」。

出來的卻沒有那麼多，這都是經驗。

我會和葉石濤認識也是因為林曙光介紹。我跟葉老的情誼很深。高雄市許多人要找葉老前，都會先請我協助引介，因為葉老不隨便見人。我對葉老另外一件印象最為深刻的事情是，眾所周知，葉老著作等身，寫過非常多的書，但葉老過世時，我受家屬委託去協助整理房子，我看他的書房內藏書量沒有很豐富，書房內有的是書桌、籐椅、一些零散的書及文具。我當時非常地詫異，那他怎麼能寫出這麼多著作，又是怎麼去評論文學家。難道，他已經把各種資料都牢記在心中了嗎？我到現在還是百思不得其解？但真的是相當佩服葉老。

其次，談到第一出版社的柯旗化，最早我是透過他弟弟與他認識。當時柯旗化因案入獄，他弟弟就常常會拿文件給我印刷或裝訂，後來柯旗化出獄後（民國 65 年〔1976〕）曾經來找過我協助印製書籍。當時，他還不知道我是什麼背景及文化思想的人，以為我只是一個單純印刷、裝訂的老闆。後來不知道從哪裡知道我長期支持黨外運動，某天就很正式來拜訪我，特地約我出去談。柯旗化因為剛出獄不久，情治單位其實還監視著他的活動，因此他來找我時，對我說：「我不知道你有在做這個（黨外）！」但當時，也沒有多講什麼，後來我們也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及合作關係。柯旗化是在第一次出獄後於民國 47 年（1958）便成立了第一出版社，靠著出版《新英文法》養活一家人，讓子弟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實在很不簡單。第一出版社後來成為歷史建築——柯旗化故居，柯媽媽因為搬到臺北和兒子一起住，所以不再繼續經營出版社，便委託我承接第一出版社後續的經營，我當時沒過多考慮就答應了，一直持續至今。

我與臺灣許多文學家彼此有些認識，春暉出版社成立之後透過創辦《文學界》凝聚了一群作家。⁷《文學界》雜誌的創辦也是一個機緣，當時臺灣最大的文學雜誌——《臺灣文藝》（民國 92 年〔2003〕停刊）面臨警備總部的清查，所以我跟葉石濤等一些文學家有另外成立雜誌的構想，我們後來找了鄭炯明及曾貴海兩位醫師來商討，跟他們說：「臺灣的文學界就看我們了！」他們反問道：「這會不會賺錢？」我說：「不會，你就當做繳

7 《文學界》，1982 年 1 月創刊於高雄，以季刊方式發行，由陳坤崙、葉石濤、鄭炯明、曾貴海、彭瑞金等人所創辦，由春暉出版社出版，陳坤崙為發行人，直至 1989 年 2 月停刊為止，共發行 28 輯。《文學界》每期有本土作家專輯或特輯，以及本土作家的評論、詩、小說及散文創作，是一本詩與小說並重、創作與評論同行，頗具分量的文學刊物。由於其著重於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展開臺灣作家研究、史料的挖掘與整理、創作的推展、臺灣文學史的撰寫等，與《臺灣文藝》、《笠》並列為 1980 年代推動本土文學的三大刊物。



圖5 《文學界》創刊號封面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提供。



圖6 1982年2月7日，《文學界》創刊紀念茶會於高雄華王飯店舉行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提供。

死會！辦到哪時算哪時。」當時創辦雜誌非常辛苦，除了稿源外，還有許多費用要支付，像《文學界》每一期都會設定一個作家座談會的主題，這些作者遠從各地來到高雄，他們也知道我們辦雜誌很辛苦，像鄭清文、李喬都從臺北來，住宿方面他們會自理，或者有時候一、兩位文學家會住鄭炯明家中，其餘的只能去住旅館，我們則盡地主之誼邀請他們吃飯。這些文學家一個介紹一個，帶動高雄的文學界風氣。在那樣噤聲的年代，《文學界》辛苦辦了七年。之後，許多作者都轉向投稿到黨外雜誌，所以稿源比較不穩定而停刊。

有趣的是，當年投稿時怕因言論獲罪，很常使用筆名投稿，也不一定固定用哪個筆名發表，彼此之間也都不知道文章是誰撰寫，像我曾在《八十年代》上發表文章，主編就問我要不要用筆名發表！所以在那樣的年代，為了能發表言論自由，筆名都會換來換去。

柒、知識分子的情懷與理想

我們成立《文學界》雜誌，也算是我的理想之一，當時的想法就是能為後代多留下些先人的文史資料。我自己的看法是隨著閱讀習慣改變，很多電子書、電子文紛紛出現。然而，資訊再發達，最後一定要留下紙本，電子產品有壽命週期，最後還是會被淘汰，



圖 7 《文學台灣》創刊號封面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提供。



圖 8 1992 年 1 月 13 日，《文學台灣》創刊紀念會於臺北舉行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提供。

唯一可以保留下來的就是實體書，保留下來的資料也可供日後所用。

如果有注意看過春暉出版社的出版目錄，就能發現我們出版的書籍有五、六百種之多。最早出版高雄文史類書籍的就是春暉出版社。其中，林曙光專研高雄文史的資料，他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後，便選在我這裡出版，我會定期地詢問他進度，也算是給他寫作的動力／壓力。林曙光總共在我這裡出版六、七本高雄文史相關的書，例如《打狗滄桑》、《打狗采風》等書，還有大受好評的《高雄人物評述》，這些書都是春暉出版社協助出版，屬於高雄在地的歷史記述。研究高雄歷史的學者或學生，看到林曙光的出版書都會很想買。許多書籍我都想改版重出，只可惜現在沒什麼體力做這些事了。

認真研究過春暉出版社的出版目錄，就知道我的理想便是發展臺灣文學。民國 70 年代（1980 年代）臺灣文學處於逐漸擺脫中國文學桎梏而日漸萌芽的階段，有學校開始主張設立臺灣文學系，有許多文人在討論臺灣文學何去何從，像陳映真、陳若曦等人都加入討論。當然，也有不少學者主張臺灣其實沒有「臺灣文學」。我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後，建議如果要在專院校設置臺灣文學系，就要從寫「臺灣文學史」著手。有了這樣的想法，我便著手規劃請作者撰寫「臺灣文學史」，但許多文學家都無法寫成。最後，我問了葉老：「如果連臺灣文學史都寫不出來，要怎麼發展臺灣文學？」葉老就毅然決然地接下了使命說：「不然我來寫！」印象中葉老僅花一個暑假的時間就完成臺灣文學史綱

的撰寫。民國 76 年（1987）春暉出版社便出版這本《臺灣文學史綱》。這本書的出版大大地鼓舞了臺灣文學的發展，民國 86 年（1997）真理大學首先設立臺灣文學系，後陸續有大學也設立臺文系。這本《臺灣文學史綱》也成為教學用書，當時一年有 1,000 本的銷量，現在還有 300 本的銷量，是臺灣文學發展重要的書籍。後來成功大學要設臺文系，本來想邀請我去演講，但我婉拒這個機會，並請他們改邀請葉老，畢竟《臺灣文學史綱》是他撰寫的，由他來講述比較合適。

最後，要提春暉出版社對於我生命的意義，就是讓我的人生有了目標。春暉出版社不僅僅是出版社，還有肩負起聯繫文學家的使命。若要說得比較崇高的理想，應該可以說有文人、知識分子對於社會實踐的一種使命感，要維護言論自由及自由出版的使命！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